

自由 交谈 1

张志林主编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九九八年·成都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028) 6662959 6666766

责任编辑 金 平
封面设计 靖明平面设计室
版面设计 金 平
责任校对 文兴华
责任印制 徐 辉

书 名 自由交谈（第1辑） 定价 9.00 元

主 编 张志林 ISBN 7-5411-1730-7/I·1516
1998 年 10 月第一版 1998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数 1-10000 册
印张 6 插页 4 字数 120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邮编 610012）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前进印刷厂印刷

目 录

主编的话

哲学何为

哲学家的手指头 陈晓平 (3)

我的哲学追求 张华夏 (13)

作为独白的和偶尔向后看的哲学

——致张志林 徐明明 (28)

哲学：一种独自而透彻的追问

——兼答徐明明 张志林 (36)

十字路口的中国

《现代化的陷阱》专论

追寻学者生命的真谛 何清涟 (45)

敲门者的声音 朱学勤 (60)

社会公正与学术良心 秦 晖 (68)

关于《陷阱》的对话

…………… 张志林·金 平 (83)

回眸沧桑

《刑法》的变迁与本世纪中国文化的

若干问题 …………… 袁伟时 (91)

论泛血缘文明及其转型 …… 金 岱 (120)

天国理想与尘世生活 …………… 赵 林 (132)

后现代在当代中国的命运 ……………

…………… 王 宾 (143)

学人心语

亚里士多德与孔子 …………… 赵东明 (187)

哲学何为

哲学家的手指头

——忆与冯友兰先生的三次学术交往

陈晓平

在冯友兰先生晚年，我有幸与他老人家有过三次学术交往。可以说，我与冯先生进行学术交往的基础是：以逻辑分析的方法探讨哲学问题。

记得十多年前我所读的冯先生的第一部著作是《中国哲学简史》（涂又光先生根据 1948 年英文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年出版）。此书不仅阐述中国哲学史，而且阐述冯先生自己对哲学及其方法的基本主张。全书高屋建瓴，言简意赅，令我赞叹不已。例如，书中对无所不包的“宇宙”亦即“大全”这个重要的哲学概念作了如下的逻辑分析：

由于宇宙是一切存在的全体，所以一个人思及宇宙时，他是在反思地思，因为这个思和思的人也一定都包括在这个全体之内。但是当他思及这个全体，这个全体就在他的思之内而不包括这思的本

身。因为它是思的对象，所以与思相对而立。所以他思及的全体，实际上并不是一切存在的全体。可是他仍需思及全体，才能认识到全体不可思。人需要思，才能知道不可思者；正如有时候人需要声音才能知道静默。人必须思及不可思者，可是刚一要这么做，它就立即溜掉了。这正是哲学的最迷人而又最恼人的地方。（第 388 页）

由于“宇宙”或“大全”既可思而又不可思，既可言说而又不可言说，所以，对它的研究就既需要“正方法”又需要“负方法”。冯先生所说的正方法就是对哲学对象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清楚地说些什么，所谓负方法就是在此分析之后保持沉默，通过体悟达到哲学的彼岸。这就是冯先生所倡导的“始于正方法而终于负方法”的哲学方法。他对中西方的哲学方法作了如下的比较：

在中国哲学史中，正的方法从未得到充分发展；事实上，对它太忽视了。因此，中国哲学历来缺乏清晰的思想，这也是中国哲学以单纯为特色的原因之一。由于缺乏清晰思想，其单纯性也就是非常素朴的。单纯性本身是值得发扬的；但是它的素朴性必须通过清晰思想的作用加以克服。清晰思想不是哲学的目的，但是它是每个哲学家需要的不可缺少的训练。它确实是中国哲学家所需要的。另一方面，在西方哲学史中从未见到充分发展的负的方

法。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产生未来的哲学。（第394~395页）

冯先生主张中国哲学家学习西方哲学，但主要不是学习它的现成结论，而是学习其中的逻辑分析的方法；借助于逻辑分析方法来整理、改造中国的传统哲学，使之清晰化和系统化。冯先生就是沿着这一途径发展中国哲学的，在其第一部哲学专著《新理学》（1939年）中，他力图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建立一个纯形式的形而上学体系，其中把传统中国哲学的最重要的观念都包含在内。我对冯先生的纯形式的形而上学体系颇感兴趣，但由于当时手边没有《新理学》，我便仔细阅读他的一篇论文《新理学在哲学中之地位及其方法》（收入《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冯先生的形而上学包含四组命题，分别关于“理”“气”“道体”和“大全”这四个中国哲学的重要观念。第一组的核心命题是：**有某种事物，蕴涵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简言之，**有某物必有某物之理**。冯先生认为，这个命题可以从一个纯形式的逻辑命题“如果甲，则甲”套出来，因而它也是一纯形式的命题。按此说法，“有某种事物”与“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是相同的概念，故可用同一个符号“甲”来表示。但是，冯先生又说，“有某种事物”之有的意义，比“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之有的意义要多：前者是实际的有，是于时空存在者；后者是真际的有，是虽不实在于时空，而亦不能说无者。按此说法，

“有某种事物”与“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不是相同的概念，故不能从“如果甲，则甲”套出来。于是，我给冯先生写信，指出他的这两种说法之间的不协调性。此信是1989年6月13日写的，冯先生于8月16日给我回信，其中谈道：

你所提的问题很好。我的那篇文章的提法，确实有问题。“某种事物”和“所以为某种事物者”的意义并不相等。其间的关系，是一个名的外延和内涵的关系。一个名，有外延，必有内涵；有内涵不必有外延。所以，可以从其有外延推知其有内涵。我对于这个问题的说法，详载《新原道》第十章和《新知言》第六章。

冯先生在信中还提议我与《三松堂全集》的总编纂涂又光先生联系（当时我们同住在武汉，据涂先生讲，冯先生曾两次在信中建议他与我联系。）涂先生看了冯先生给我的回信觉得有新意，经他推荐，连同我的信一道发表在《中州学刊》1990年第4期上。我按照冯先生的指点，仔细阅读他的《新原道》和《新知言》，并且产生了新的问题和看法。

冯先生在《新知言》第六章中，把“有某种事物，必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中的“有某种事物”改为“某种事物为某种事物”。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改进，而是其形而上学的出发点的改进。因为，“有某种事物”断定了某种事物的存在，因

而对于实际有所断定；而“某种事物为某种事物”却没有断定某种事物的存在；后者实际上就是形式逻辑中的同一律“甲是甲”，其真实性与甲的存在与否是无关的。如果我们把语言世界称为“真际”，把既可说而又不可说的世界称为“道际”，那么冯先生修改后的形而上学体系就不是他所说的从实际出发，而是从真际出发；不是他所说的从实际推出真际，而是从真际推出道际。我的这一看法更符合冯先生对形而上学的一般要求即：于实际不作断定，要“空灵”而不要“拖泥带水”。然而，冯先生自己却似乎只把这一改进看作技术上的，而未看作是出发点上的，因此他仍然沿用以前的说法，即“形而上学的工作，是对于经验，作形式的释义。”这就是说，形而上学的出发点仍然是经验的实际，而非超经验的真际。我不同意冯先生的这一提法，尽管我赞同他对其形而上学体系所作的改进。于是，我第二次写信给冯先生，谈了这些看法以及对其形而上学的改进所作的进一步扩展。此信写于1990年7月18日。十几天之后，收到冯先生的回信。信中说他的脑力突然衰退，不能作深入的思考；建议我发表那些看法，不要有所顾虑。四个月之后即1990年11月26日，便从北京传来冯先生逝世的噩耗。一方面，我为中国失去这样一位大哲学家和思想家感到深深的悲哀和惋惜；另一方面，作为对先生的纪念，我尽快将信中的看法整理成文，以《关于冯友兰先生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出发点及其改进》为题发表于《中州学刊》1991年第1期。

我与冯先生的这两次通信，在《冯友兰先生年谱初

编》（蔡仲德著）中均有记载。从该年谱中还可看到，冯先生是在临终前5个月才写完《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最后一册即第七册的。那时他已有95岁高龄，并且双目失明，病魔缠身，多次经历病危抢救。我真想象不出冯先生是怎样完成这部数百万字的巨著的。听曾在冯先生身边工作过较长时间的涂又光先生讲，冯先生的每一部著作的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他自己的，助手只起记录的作用。我不禁为冯先生这种惊人的毅力和崇高的使命感敬佩至极！我觉得，冯先生是天地境界中的人，他已超越生死，其生命与事业同在，与社会同在，与自然同在。他书写完了，脑力也就随之衰竭了，就在此时，他还没有忘记给一个无名晚辈写回信。

以上谈了我与冯先生的两次通信，在此之前，我还与冯先生进行过一次短暂的面谈，那是1986年11月前后的事情。那年我读了冯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和《三松堂学术文集》以后，对冯先生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决定利用在北京的机会去拜访冯先生一次。拜访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请教学术上的问题，另一（或许更主要）是为亲眼看看这位大哲学家的风范。

在一个略带寒意但却天气晴朗的下午，我没有事先联系就冒昧地踏进景仰已久的三松堂的院子，心里多少有些忐忑不安。院内无人，十分静谧。我在苍劲葱郁的三棵松下停留片刻，一面体味其中的奥妙，一面思忖是否敲门进屋。正在这时，一位姑娘推着自行车进来。她礼貌地问我找谁，我说找冯友兰先生。她爽快地说：“跟我来吧！”她把我带进客厅，然后听到她在走廊上大

声说：“爷爷，有客人！”不一会，她回来说：“爷爷请你到他书房去。”当我走进冯先生的书房时，一位中年人正在收拾桌上的书稿；看来他们正在工作，而被我的到访打断了。我心头掠过一丝歉意。这时，九十高龄的冯先生正坐在藤椅上，身着布衣，身体微胖，蓄着长须，面带微笑，虽然老态龙钟，却看上去很有精神。冯先生主动地同我握手，我觉得他的手软绵绵的，心情立刻松弛下来。我坐下后便开门见山地向冯先生提出问题。我问道：“在什么意义上说，‘有某物，必有某物之所以为某物者’是一逻辑命题，是否在因果关系的意义上，即把后者看作前者的原因？”冯先生回答说：“不，后者是前者的规定。”我仍然不太明白，指着眼前的书桌继续问道：“这张桌子怎样逻辑地蕴涵其规定呢？”冯先生回答说：“如果没有其规定，你就不能说‘这张桌子’，而只能说‘这个’‘那个’，一旦你说出‘这张桌子’，桌子的规定性就在其中了。”听到这里，我恍然大悟。我隐隐地觉得，冯先生的形而上学与语言行为密切相关，这为我日后进一步研究他的理论打下基础。冯先生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话说得很慢，显得有些吃力，但是他的思维却异常敏锐。我的问题已经得到解答，而且我也亲眼目睹冯先生的尊容，亲耳聆听冯先生的教导，我的主要目的都达到了，不好意思再耽搁他老人家的宝贵时间，于是，我起身告辞。冯先生始终面带笑容，再次同我握手。当我走出屋子的时候，不禁停下脚步，抬头仰望那三棵松树。看上去，它们历尽沧桑而又充满生机。

在我研读冯先生的新理学的过程中，一开始便注意其逻辑上的问题，这也正是冯先生自己始终关注的问题。冯先生在其临终前写完的最后一册书即《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由于某种政治上的原因，此书未能在大陆出版，而以《现代中国哲学史》于1992年在香港单独出版）中，坦率地指出自己的“新理学”的理论矛盾，即一方面说理是不存在而有，另一方面又说理是一种潜存；“其根本的失误，在于没有分别清楚‘有’与‘存在’的区别。”（第222页）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冯先生是以怎样严格的态度对待逻辑分析的方法和自己理论的缺陷的，这是典型的分析哲学的风格。事实上，“存在”（existence）和“有”（being）的区别问题也是现代西方分析哲学家们热烈争论的问题之一。不过，在我看来，冯先生的新理学的理论矛盾的根源主要地不在于未对“存在”与“有”作出区分，而在于没有把“真际”坐实到语言上去。这使得，冯先生谈到真际时只能用一些比较含混的语词，如“虽不实在于时空，而亦不能说无者”或“不存在而有”。反之，如果把“真际”坐实到语言上去，我们便可以说，真际不是语言所描述的世界，而是语言世界本身；相应地，真际中的事物不存在于时空中，而只存在于语意中。语意中的事物可以与实际中的事物毫无关系，因此，从逻辑上讲，真际并不“潜存”于实际，而它又是存在着的。这样，冯先生的新理学的理论矛盾便从原则上得到消解。

在我看来，冯先生的形而上学包含着语言学的转向，这种转向是他试图建立一种纯形式的形而上学体系

的目标所注定了的。如果说，当他最初以“有某种事物”为其形而上学的出发点时，此转向尚不太明显，那么，当他为克服其理论矛盾，将出发点改为“某种事物为某种事物”时，其语言学转向便昭然若揭了。前面已经提到，冯先生的形而上学并不像他自己所说，是从实际推出真际，而是从真际推出道际。我对冯先生的形而上学所作的这一评论与冯先生对其形而上学的另一些看法是相符的。如，冯先生多次谈到，在“理”“气”“道体”和“大全”这四个观念中，只有“理”是可思或可说的，其余三个都是不可思或不可说的。冯先生的新理学是从理谈起，然后谈及气、道体和大全，而理世界就是我所说的真际，气、道体和大全这些既可说而又不可说的观念就是我所说的道际。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冯先生明确地看到理与其余三个观念的重大区别，但却没有把它们在范畴上加以区分，而是把它们放进同一个领域即真际中，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个理论缺陷。我想，导致冯先生这一理论缺陷的根源在于他没有把真际坐实到语言上，这便使得道际无从谈起。不过，冯先生毕竟看到了理与其余三个观念之间的重大区别，并且是通过细致的逻辑分析指出这一点的。这正是从清晰处说起而后达到不可说处，用冯先生的话讲，就是始于正方法而终于负方法。

把逻辑分析用于哲学研究，在这方面，冯友兰先生和金岳霖先生堪称中国哲学家的典范，他们二人一起开了中国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之先河，其对中国哲学发展之意义是无法估量的。谈到逻辑与哲学，特别是逻辑与

中国哲学之间的关系，冯先生在其《中国哲学简史》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说是有人遇见一位神仙，神仙问他需要什么东西，他说他需要金子。神仙用手指头点了几块石头，石头立即变成金子。神仙叫他拿去，但是他不拿。神仙问：“你还要什么呢？”他答道：“我要你的手指头。”逻辑分析法就是西方哲学家的手指头，中国人要的是手指头。（第 378～379 页）

我赞同冯先生的这一说法，并立志沿着他所指出的哲学之路走下去。